

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评价及其演变跃迁

罗蓉¹ 何黄琪² 陈爽³¹

(1. 湘潭大学 商学院, 中国湖南 湘潭 411105;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中国广西 南宁 530000;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从“人—业—地”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借鉴“双临界值”思路, 测算出2011—2020年我国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指数。应用ArcMap空间分析软件, 用共同富裕能力指数变化来探究原连片特困地区整体和不同片区从脱贫到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的10年时空演化过程和特征。研究发现: (1) 原连片特困地区整体的共同富裕能力提升显著, 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 单省片区、大型片区、集中片区与跨省片区、小型片区、分散片区相比, 两种对应类型片区之间共同富裕能力差距逐渐缩小。(3) 单省片区、大型片区、集中片区共同富裕能力目前仍相对较低, 但增长幅度相对更大。(4) 跨省片区、小型片区、分散片区“人—业—地”关系更均衡, 具有相对更高的共同富裕能力。

【关键词】: 连片特困地区 共同富裕 减贫与脱贫 乡村振兴 人-业-地 评价 教育与医疗

【中图分类号】: F12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8-0154-11

2020年, 我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 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反贫困首要目标。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谱写的壮丽历史篇章, 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 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1]。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主动, 薪火相传探索共同富裕道路, 始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大步前进。因此消除绝对贫困绝不是终点, 而是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的起点。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十四五”规划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五次强调“共同富裕”。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到2035年,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到21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可见,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需要我们长期努力和奋斗^[2]。

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8, 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还很大, 这与当前我国面临的区

作者简介: 罗蓉 (1970—), 女, 湖南醴陵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城镇化。E-mail:dearlrong@xtu.edu.cn; 何黄琪 (1997—), 女, 广西南宁人, 硕士,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宏观经济和大数据应用。E-mail:hhq399@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9BJY062);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8YBA409)

域发展不平衡突出矛盾密切相关。其中,原连片特困地区 1 涉及我国 21 个省份 689 个县域,人口多,分布广,农村居民占比大,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相对落后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 年,全国人均 GDP 超 7.2 万元,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 元。而 2020 年原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均 GDP 为 35433 元,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800 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13248 元^[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尽管已实现绝对脱贫,原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落后状况仍然十分严峻。如何缩小原连片特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是我国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上必须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1 相关文献综述

学界对贫困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颇丰。减贫脱贫与共同富裕一脉相承,脱贫攻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3],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重点是开展相对贫困治理^[4],必须注重脱贫的可持续性、效率和质量,全力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5,6]。习近平总书记尤为关注农村的共同富裕问题,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7],乡村全面振兴是促进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选择^[8]。有学者立足湖南和西南民族地区,提出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长效机制,动态监测防止规模性返贫,形成以脱贫+致富为发展目标的行动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9,10]。

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对贫困和共同富裕的测度和评估,相关研究成果众多。Sen 最早将贫困扩展为由多种能力不足导致的相对剥夺感的缺失^[11],由此贫困测度从单维向多维扩展,如收入—闲暇二维 H-M 指数、生命—教育—生活三维 HPI 指数和 MPI 指数、基于公理化条件的 CH-M 指数和 F-M 指数、基于社会福利方法的 Watts 多维贫困指数等^[12,13,14]。多维贫困测度能更全面地反映相对贫困内涵和致贫原因差异,具有良好的指标可分性和丰富的政策内涵。目前学界应用最多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是 A-F 法以及 MPI 指数法,将多维贫困分解为健康、教育、生活质量的不足^[15]。此外,有学者还综合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理论,不断发展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如“发展”与“贫困”的对应关系、生活性消费、社会风险与机会、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生态贫困与可持续协调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等,以探究相对贫困的产生机制^[16,17,18,19,20,21]。

共同富裕的内涵既指富裕的共享,也指共享的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22]。从此内涵出发,大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从共享和富裕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多维指标体系。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培林从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设计,并进一步从人群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对共享维度进行细分^[23]。孙豪、申云等沿袭了相同思路,但采用了多种指标对共享和富裕两个维度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分解,并对民族地区、省域进行了测度^[24,25]。此外,陈丽君、李金昌等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在共享和富裕两个维度基础上还增加了可持续性维度^[26,27]。上述研究大都从理论层面探讨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逻辑,少数成果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对民族地区、省域的共同富裕程度以及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测度,但总的来说,目前运用县域统计数据研究与分析更大范围的原连片特困地区脱贫与共同富裕时空演变过程、规律和特征的成果还亟待补充。

减贫、脱贫与共同富裕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原连片特困地区 10 年的减贫脱贫是为了提升共同富裕能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构建共同富裕能力指数,以时间、空间为逻辑主线,时间跨度为 2011—2020 年,空间跨度为原第 I 类连片特困地区的 505 个县域,分析总结原连片特困地区从脱贫到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的时空演化过程和结构特征,相比现有文献时间跨度更长,空间跨度更广。更进一步地,根据空间分布差异将原第 I 类连片特困地区分为跨省片区和单省片区、集中片区和分散片区以及大型片区和小型片区等不同类型的片区,对不同类型的片区 10 年的脱贫时空轨迹、结构特征和共同富裕能力的变化进行细致剖析,深入总结不同类型片区脱贫与共同富裕关系的不同特点,对原连片特困地区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道路上稳定、有效、可持续致富,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2 原连片特困地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2.1 原连片特困地区概况

2011 年我国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确立了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这些片区覆盖了我国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6 个地级行政区及 689 个县级行政区，覆盖范围广、涉及人口多、贫困程度高。

在 14 个片区中，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 3 个片区主要分布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集中地区、高原荒漠地带，在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条件和背景等方面与其他 11 个片区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落后程度更深，成因更复杂，国家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此外，这 3 个片区数据、信息等资料搜集难度大，统计数据的可得性较低。为此本文将这 3 个片区称为原第 II 类连片特困地区，暂时不做研究。其余 11 个片区覆盖 19 个省级行政区、104 个地级行政区、505 个县级行政区，从我国东北角到西南端连续分布，覆盖面广、涉及省份和县域更多，片区内外联系相对紧密，可比性更强，统计数据可得性较好。本文将这 11 个片区称为原第 I 类连片特困地区并作为研究对象。

2.2 数据说明与预处理

县域是农业的主要集中地、农村的主要分布地和农民的主要生活地，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县域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原连片特困地区组成单元均为县域，已从脱贫攻坚主战场转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的主战场。鉴此，本文数据以县级行政区为统计单元，以县域为统计单位，样本量更大，信息更全面，研究更深入更有针对性。剔除缺失指标过多的样本后，对仍有个别年份缺失值的统计单元进行插值填充，最终的空间跨度为原第 I 类连片特困地区的 505 个县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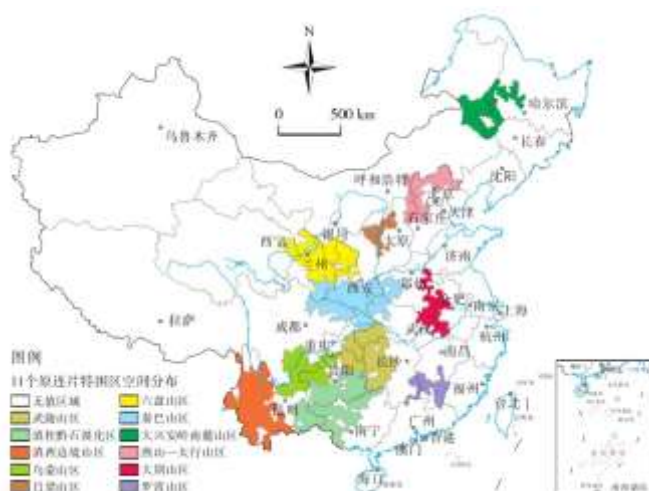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原第 I 类连片特困地区空间分布图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 GS(2020)4628 号标准地图及各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制作。图 4、图 5 同。

本文以国家确立连片特困地区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的 2011 年为数据时间起点，时间跨度为 2011—2020 共 10 年，所使用的经济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区人民政府网站、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统计年鉴、公报等，地图信息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基于上述时间和空间跨度的权威统计数据,构建包含 3 个维度 21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测度县域共同富裕能力,应用 Stata16、ArcMap 等软件分析原连片特困地区从减贫、脱贫到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的时空演化过程和结构特征。

3 县域共同富裕能力指数测度方法与计算步骤

根据可行能力剥夺理论,贫困绝不仅仅表现为单方面的收入水平低下,还表现为教育、医疗健康、住房质量等多方面的缺失^[15]。同理,原连片特困地区在取得脱贫攻坚胜利的过程中,不仅仅有收入的变化,还必然在居民教育、医疗、社会生产、生态条件等多方面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即共同富裕能力的变化。

因此,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构建多维共同富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县域共同富裕能力指数^[15],并以县域数据汇总计算原连片特困地区 505 个县域的共同富裕能力水平,为总结从减贫、脱贫到提升共同富裕能力的时空演变轨迹提供数据支持,为促进原连片特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具针对性、现实必要性的建议。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①设计指标体系并确定权重。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社会人在生存活动和社会生产活动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这个过程亦即人类社会不断解决贫困向共同富裕迈进的过程。这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交错构成的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在此系统中,“人”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利用和改造“地”形成“业”,是缓解贫困和实现富裕的必然逻辑。业弱则贫,业强则富。在特定地域内暂时无法达到共同富裕目标,则表现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社会福利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发生要素关系的失衡,也即“人一业一地”为核心要素构成的系统失衡的结果^[28,29]。鉴此,本文从“人一业一地”三个维度综合衡量原连片特困地区经减贫、脱贫到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所发生的变化。

其中,“人”维度描述人类生活资本,居民收入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首要因素,收入状况又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水平,劳动就业与工资水平反映了人类获取收入的机会与可能,教育、医疗健康、社会福利关乎人类生存生活的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共享相关;“业”维度描述社会生产机会,包含用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等宏观经济发展指标来描述富裕程度,并用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水平表现社会发展机会与共享,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刻画共享程度,城乡收入差距小则共享程度高;“地”维度描述自然生产条件,农业仍然是制约农村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以常用耕地占有面积反映土地资源压力,以设施农业面积、机收面积反映土地资源利用质量,以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及社会资源共享压力,并且还以农业机械化动力及粮食产量来考量土地生产能力和农业生产水平,反映资源禀赋压力对共同富裕能力的影响。综上,本文所构建的共同富裕能力指数(CPCI)测度指标体系共包括“人一业一地”3 个维度,共 21 项具体指标,并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将各维度权重设置为相等。后面正文和表格中的 CPCI 值均在此基础上,根据 2011—2020 年县级统计数据计算并整理得出。CPCI 值越大,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越强。

②设定临界值并赋值。记 K_i 为第 i 项指标的赋值,当第 i 项指标超过临界值,即认为该地区在该方面不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处于更具有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能力的新阶段,赋值为 1。没有达到该临界值时,即认定在该方面仍处于贫困水平,缺乏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赋值为 0。关于临界值的选取目前尚未有共识,本文参考相对贫困临界值有关研究,借鉴 A-F 方法中“双临界值”设定思路,将同一时间样本数据均值的 70%作为临界值^[18]。同时,本文还依据不同的样本范围做了尝试,并对比了测度的结果,一是组间临界线,对于全国县域样本、各省份县域样本分别选取样本均值 70%作为临界线;二是组内临界线,对于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域样本、各个片区县域样本同样以样本均值 70%作为临界线。

③根据等权重法,计算“人一业一地”共同富裕能力指数和各维度能力。同时,分别计算出属于同一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域共同富裕能力指数均值,以此来反映该片区共同富裕能力,以此从片区层面探究共同富裕能力的时空演进过程,并对不同类型片区共同富裕能力的变化特点进行总结。

借鉴 A-F 方法中第二道共同富裕能力临界值的划定，为更直观反映共同富裕能力的时空差异性，本文将共同富裕能力等级更细化地划分为 5 个级别，I 级为缺乏共同富裕能力，II、III、IV 级分别表示为弱、中等、强共同富裕能力，V 级为极强共同富裕能力。CPCI 值越大，相对贫困程度越轻，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越强^[30]。

本文根据研究末期与初期的共同富裕能力指数之比衡量各片区共同富裕能力动态跨期变化度（ V_t ）。另外，本文将各片区动态跨期变化度与全国县域、原连片特困县域整体平均动态跨期变化度进行比较，从而划分其变化程度^[30]。

4 结果与分析

4.1 原连片特困地区整体共同富裕能力的时间变化轨迹

4.1.1 时间纵向变化

根据前述共同富裕能力指数设计和测度方法，我们以全国县域样本、各省份县域样本分别选取样本均值 70% 作为组间临界线；以原连片特困地区总的县域样本均值、11 个片区分别所辖县域样本均值的 70% 作为组内临界线，计算原连片特困地区的共同富裕能力指数。

结果显示，不论是组间临界线结果还是组内临界线结果，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指数都在逐渐上升。其中组间临界线下，分别从 2011 年的 0.1864 和 0.4273 上升至 2020 年的 0.3299 和 0.4795，组内临界线下，分别从 2011 年的 0.5484 和 0.6011 上升至 2020 年的 0.5701 和 0.6270，说明原连片特困地区在 2011—2020 年经过 10 年减贫奋斗到实现绝对脱贫，其自身的共同富裕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从全国县域样本均值 70% 作为临界线的计算结果进一步对原连片特困地区与全国县域、其他县域进行横向比较来看，2020 年，原连片特困地区的共同富裕能力指数为 0.3299，远低于其他县域平均值 0.4543，与全国县域平均水平 0.4293 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这意味着要实现共同富裕，原连片特困地区还需奋力追赶。

计算结果也显示，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指数的提升是最快的，从 2011 年的 0.1862 增至 2020 年的 0.3299，年增长率为 7.7%，其他县域的年增长率为 5.3%，全国县域的年增长率为 5.6%，说明原连片特困地区的共同富裕道路充满希望。

分别从县域层面和片区层面来看，2011—2020 年县域层面与片区层面共同富裕能力指数总体上升。其中，原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状况明显得到改善，具有弱共同富裕能力的县域数量稳步增长，2019 年具有中等共同富裕能力的县域及片区数量明显增加，表现亮眼。另外，缺乏共同富裕能力的县域及片区数量明显减少，至 2020 年，缺乏共同富裕能力的县域数量已经从接近 70% 的比重降至仅占 15% 左右，缺乏共同富裕能力的片区数量已经降为 0。

但目前具有强共同富裕能力的县域极少，尚无具有强共同富裕能力的片区，具有极强共同富裕能力的县域和片区均为空白。

从上述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域层面和片区层面的共同富裕能力的级别变化来看，原连片特困地区“人一业一地”均衡发展有一定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程度有一定改善，共同富裕能力有一定提升（图 2）。

4.1.2 时点横向变化

2011 年，除罗霄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大别山区以外，绝大部分片区缺乏共同富裕能力，“人一业一地”发展潜力不足，共同富裕能力指数均低于 0.2，仍处于最低等级，贫困状况较为严峻。至 2020 年，乌蒙山区、滇桂黔石

漠化区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共享水平，而滇西边境山区“人一业一地”发展成效较好，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增长最为显著，已摆脱末三位的行列，成为排名前三的片区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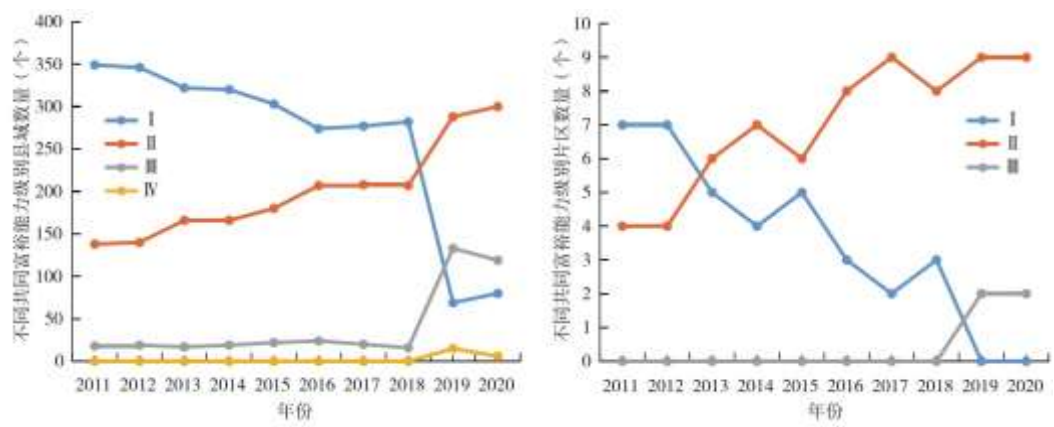


图 2 县级及片区层面共同富裕能力级别统计及变化

注：图中 I 级为缺乏共同富裕能力，II 级为弱共同富裕能力，III 级为中等共同富裕能力，IV 级为强共同富裕能力。

另外，集中于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大别山区等邻近东部及东北部片区的县域共同富裕能力上升最快，尽管 2011 年处于弱共同富裕能力级别，但 2020 年已上升至中等共同富裕能力级别。2020 年，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人一业一地”发展及共享程度最好，成为共同富裕能力排名首位的片区（图 3）。4.4.1.3 动态跨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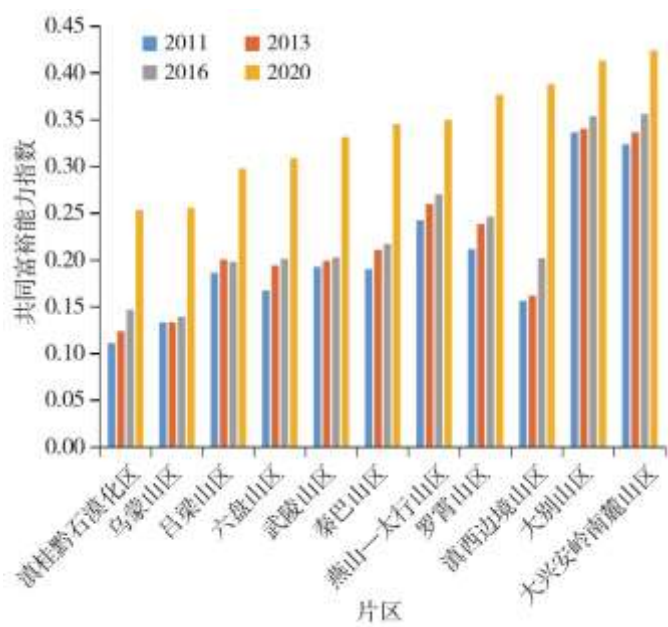


图 3 2011、2013、2016、2020 年各片区共同富裕能力变化与对比

2020 年原连片特困地区的共同富裕能力是 2011 年时 1.77 倍，比其他县域的提升幅度高出 24 个百分点，说明原连片特困地

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为原连片特困地区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步伐，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原连片特困地区的空间范围广阔，不同片区的共同富裕能力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不同片区共同富裕能力变化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大别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始终处于相对较高的共同富裕能力水平，但相对地其共同富裕能力提升较为缓慢；中速增强片区为吕梁山区、武陵山区，所占片区数量最少；集中分布于西部的秦巴山区、六盘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是共同富裕能力快速增强片区，数量最多，覆盖县域数量多、范围广，“人一业一地”发展潜力及共享程度最高。

4.2 原连片特困地区整体共同富裕能力的空间变化

4.2.1 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空间分布变化

本文利用 ArcMap10.2 空间分析软件分级色彩直观表现共同富裕能力随时间演进的变化趋势。从图 4 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变化：①相比 2011 年，2020 年原连片特困地区实现了缺乏共同富裕能力的片区清零；②2011 年，原连片特困地区的共同富裕能力低下，只有四个片区为弱共同富裕能力，其余 7 个片区均缺乏共同富裕能力，至 2020 年，原连片特困地区出现了 2 个中等共同富裕能力的片区，2011 年时的 7 个缺乏共同富裕能力的片区升至弱共同富裕能力，仅 2 个片区级别未提升，仍处于弱共同富裕能力级别。

进一步观察可发现，2011 年时，大部分片区都处于缺乏共同富裕能力的状态，但到 2022 年，这些片区都升至弱共同富裕能力级别。2011 年时的弱共同富裕能力片区中只有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和大别山区升级至中等共同富裕能力级别，燕山—太行山区和罗霄山区仍处于弱共同富裕能力级别。

此外，在同一时点下，西部片区共同富裕能力指数相对更低，邻近东部及东北部片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更强，相对更集中分布的片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较低，相对分散分布的片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较强。其中，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大别山区始终保持相对较高的共同富裕能力，尽管 2011 年共同富裕能力也比较弱，但 2020 年已率先提升至中等共同富裕能力级别。

总体来看，原连片特困地区的共同富裕能力有一定提升，东部片区好于中西部片区。但目前所有片区都未能进入强共同富裕能力以上级别。

4.2.2 各片区共同富裕能力动态跨期变化度的空间变化

临近东部及东北部片区虽然一直具有相对较高的共同富裕能力，但其共同富裕能力提升幅度较小，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中部片区次之；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及西北部的片区是共同富裕能力快速增强片区，县域数量多，覆盖范围广，“人一业一地”共同富裕能力快速增强，超越了全国及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域平均水平，缩小了与中部、东部地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与共享程度差距（图 5）。

4.3 不同类型片区划分及共同富裕能力变化特征

4.3.1 单省片区 VS 跨省片区

从片区涉及省份数量来看，除滇西边境山区因完全位于云南省域内被划分为单省片区外，其他片区均可划分为跨省片区。在跨省片区中，秦巴山区地跨 6 省，为跨省数量最多的片区，罗霄山区和吕梁山区地跨 2 省，为跨省数量最少的片区。

2011 年，跨省片区共同富裕能力指数高于单省片区，单省片区即滇西边境山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能力较低，贫困状况相对更严重；2020 年，单省片区共同富裕能力指数已经高于跨省片区整体平均水平，共同富裕能力有了较大提升。从“人一业一地”三个维度来分析，单省片区三个维度上升明显，尤其是，人类生活资本能力增幅最大，社会生产机会能力提升次之。跨省片区三个维度能力提升幅度相对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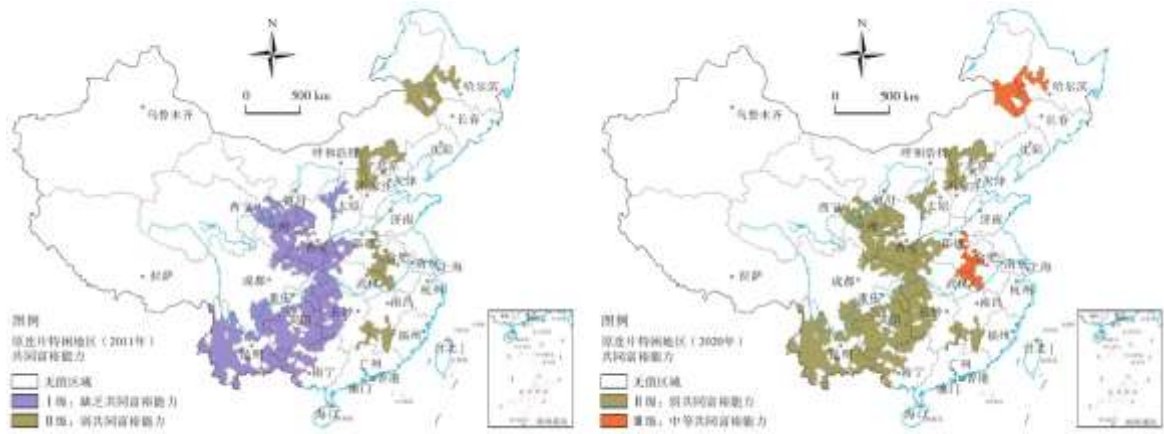


图 4 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空间分布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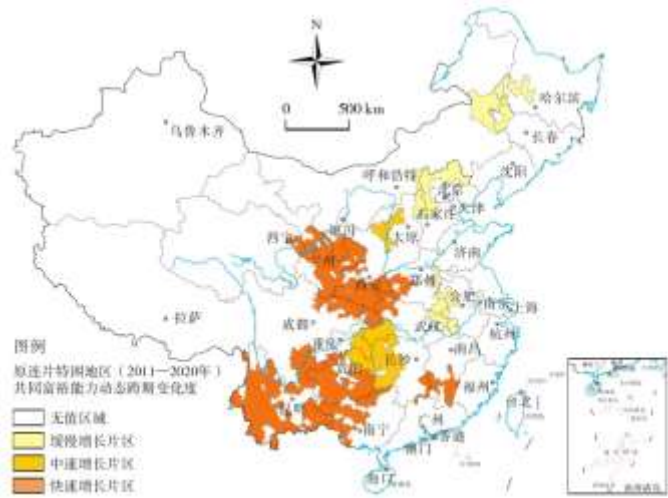


图 5 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动态跨期变化度空间分布

4.3.2 大型片区 VS 小小小型片区

从片区覆盖的县域数量来划分，本文将所含县域数量超过 50 的片区划分为大型片区，包含了滇桂黔石漠化区（80）、秦巴山区（75）、武陵山区（64）、六盘山区（61）、滇西边境山区（56）共 5 个片区，而所含县域数量低于 50 的片区被划分为小型片区，即乌蒙山区（38）、大别山区（36）、燕山—太行山区（33）、罗霄山区（23）、吕梁山区（20）、大兴安岭南麓山区（19）共 6 个片区。

2011—2020 年，大型片区与小型片区共同富裕能力指数均有所上升，大型片区始终低于小型片区，但大型片区增长幅度更

大。大型片区与小型片区之间共同富裕能力的差距逐渐缩小，至 2020 年，两者已十分接近，可见大型片区共同富裕能力得到了较大改善，相对贫困逐渐缓解。另外，大型片区“人一业一地”三个维度增长幅度均高于小型片区，其中人类生活资本维度 2020 年与小型片区非常接近，社会生产资本维度已超越小型片区，仅有自然生产条件维度仍相对比较落后，需加大力度改善。

一方面，这 5 个大型片区主要分布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并以西部地区为主。所覆盖面积非常广且相对更集中，共包含了 336 个县域，其中部分片区甚至还涉及了边境区域、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地震频发地区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比较复杂的区域，大型片区的初始贫困状况相对更严峻。2011—2020 年，大型片区“人一业一地”人类生活资本增加最为显著，同时社会生产机会、自然条件也有较大增幅，有效提升了共同富裕能力。

另一方面，小型片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地区，个别片区分布邻近东部及东北部，所覆盖面积比较小且相对更零散，自然生产条件相对较好，受到恶劣自然环境的约束较小。但小型片区社会生产机会、自然生产条件的增幅较小，为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在进一步扩大人民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优势，保持民生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共享的同时，还应注重提升社会生产机会、改善自然生产条件，稳固推动“人一业一地”三维度共同发展，加快提升共同富裕能力。

4.3.3 集中片区 VS 分散片区

从片区分布集中程度而言，位于西南的片区分布比较集中，与多个片区相邻，而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这些片区分散分布，没有与其他片区直接相连。

集中片区初始贫困状况相对更严重，是原连片特困地区中县域分布最紧密、覆盖范围最广的集中区域，2011—2020 年，其共同富裕能力始终低于分散片区，“人一业一地”各方面发展与共享能力均不足。但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集中片区共同富裕能力提升的幅度更大，逐渐缩小与分散片区之间的差距，其共同富裕能力增长速度相对更快。具有共同富裕能力快速增强特点的片区大多分布于集中片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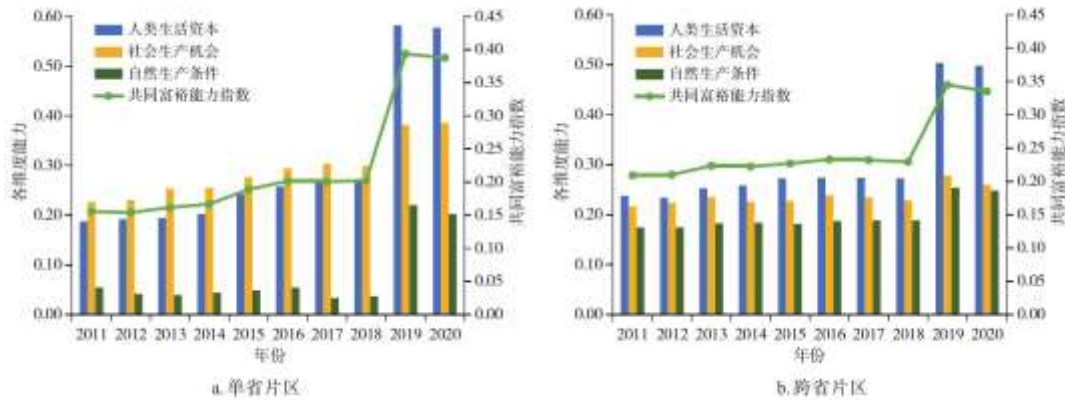


图 6 单省片区与跨省片区共同富裕能力状况对比

一方面，集中片区主要分布于中部至西南部，聚集的片区数量多，所涉及的省份为贵州、四川、云南、湖南等中西部省份，所辖县域空间分布更集中，少数民族地区较多，自然环境相对更复杂，资源条件相对落后，在社会生产机会和自然生产条件方面受到较大制约，发展基础更薄弱。但集中分布片区由于县域数量多、分布密集、涉及面积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更大的关注，更有机会获得多方面支持，这可能是集中片区近年来共同富裕能力提升较快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分散片区几乎不与其他片区相邻，分布相对零散，不具有那么强的地区集中性和联动性，所辖县域数量相对较少且分散，共同富裕能力提升较少。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人一业一地”三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2011—2020 年县域统计数据，对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进行测度和评估，分析总结原连片特困地区从脱贫到迈向共同富裕的时空演化过程及特征，为进一步缩小原连片特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突出矛盾，最终实现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总体来看，2011—2020 年，原连片特困地区的整体共同富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尽管与全国和非原连片特困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原连片特困地区共同富裕能力的增长速度更快，为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和发展势头。从各个片区来看，邻近东部及东北部片区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共同富裕能力，但增长较为缓慢；中西部及西北部片区共同富裕能力增长速度最快，超越了全国及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域平均水平，逐渐缩小了与中部、东部地区的差距。从不同类型片区来看，单省片区、大型片区、集中片区共同富裕能力相对较低，但增长幅度相对更大；跨省片区、小型片区、分散片区的共同富裕能力相对较高，但增长速度较慢；单省片区、大型片区、集中片区与跨省片区、小型片区、分散片区差距逐渐缩小，原连片特困地区内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一定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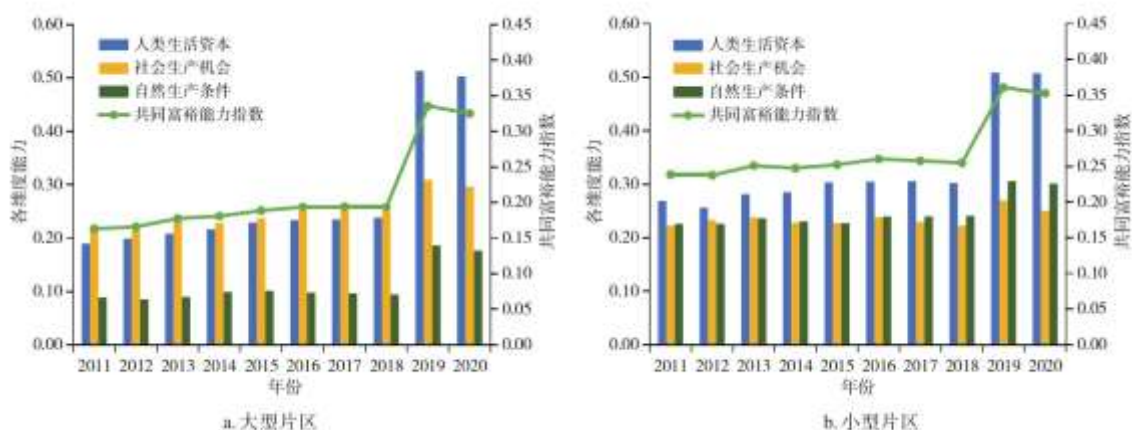


图 7 大型片区与小型片区共同富裕能力状况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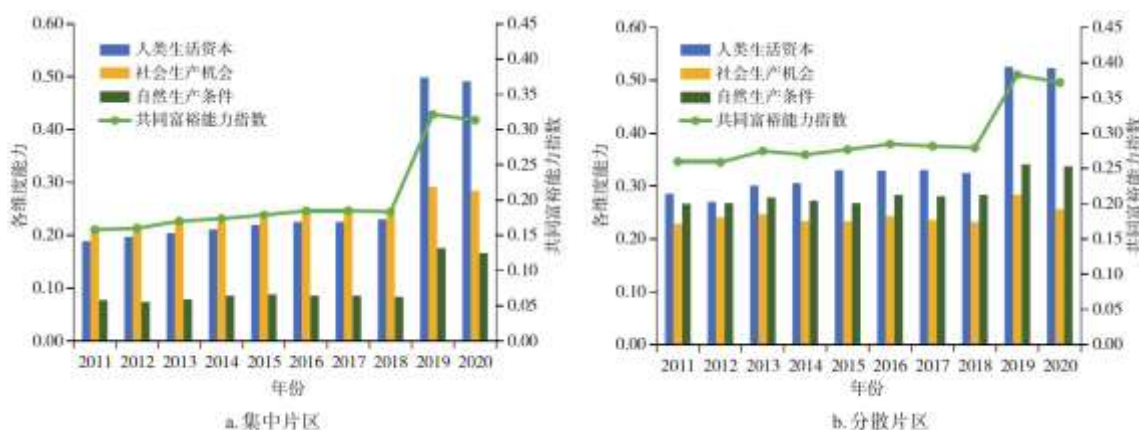


图8 集中片区与分散片区共同富裕能力状况对比

原连片特困地区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更要大力提升共同富裕能力,从“人一业一地”三个维度综合发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首先,原连片特困地区应有整体意识和全局意识,采取相对统一的战略方针政策,进一步扩大在共同富裕能力提升速度方面的优势,持续稳步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快速追赶发达地区。其次,应重视原连片特困地区不同片区的差异,结合片区分布、组成和结构等特点,科学动态划分片区类型,因地制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如建立“人一业一地”平衡发展动态监测评估机制及时发现短板并予以调整,建立省际联动协调机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建立多层次对口帮扶机制实施先富帮后富等,使得无论是小型片区、单省片区、分散片区还是跨省片区、大型片区、分散片区都能得到实质性的支持,有效增强不同类型片区的共同富裕能力。

参考文献:

- [1]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6/10/content_5616833.htm, 2021-05-20.
- [2]李实. 充分认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J]. 治理研究, 2022, 38(3): 4-12, 124.
- [3]王禹瀚. 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西方减贫理论的超越[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6(2): 109-118.
- [4]陈宗胜, 黄云.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21, 43(5): 1-19.
- [5]邹璠, 周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减贫的思想演进与历史成就[J]. 财经研究, 2022, 48(8): 4-17, 93.
- [6]杨文圣, 朱叶. 论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路径[J]. 学术界, 2022(3): 101-110.
- [7]黄祖辉, 叶海键, 胡伟斌. 推进共同富裕: 重点、难题与破解[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6): 2-11, 126.
- [8]王思斌.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J]. 探索与争鸣, 2022(1): 110-118, 179.
- [9]周国华, 于雪霞, 贺艳华, 等. 湖南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思考[J]. 经济地理, 2021, 41(8): 10-18.
- [10]刘涛. 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J]. 民族学刊, 2022, 77(3): 1-7.
- [11]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2]Hagenaars A. A class of poverty indice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7(28): 583-607.
- [13]Tsui K 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ices[J].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2, 19, 69-93.
- [14]Chakravarty S R, Deutsch J, Silber J. On the Watt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C]. The Many Dimensions of Pover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5, August 29-31.

-
- [15]Alkire S,Foster J.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0,95(7):476-487.
- [16]丁建军.中国 11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程度比较研究——基于综合发展指数计算的视角[J].地理科学,2014,34(12):1418-1427.
- [17]杨振,江琪,刘会敏,等.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测度与空间格局[J].经济地理,2015,35(12):148-153.
- [18]郑长德,单德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时空演进[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35-146.
- [19]潘竞虎,胡艳兴.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多维贫困空间识别[J].经济地理,2016,36(11):124-131.
- [20]王艳慧,钱乐毅,陈烨烽,等.生态贫困视角下的贫困县多维贫困综合度量[J].应用生态学报,2017,28(8):2677-2686.
- [21]周扬,郭远智,刘彦随.中国县域贫困综合测度及 2020 年后减贫瞄准[J].地理学报,2018,73(8):1478-1493.
- [22]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2021,56(11):4-13.
- [23]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37(8):117-129.
- [24]孙豪,曹肖烨.中国省域共同富裕的测度与评价[J].浙江社会科学,2022(6):4-18,155.
- [25]申云,尹业兴,钟鑫.共同富裕视域下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测度及其时空演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2):103-114.
- [26]陈丽君,郁建兴,徐钦娜.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治理研究,2021,37(4):5-16,2.
- [27]李金昌,余卫.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J].统计研究,2022,39(2):3-17.
- [28]李寻欢,周扬,陈玉福.区域多维贫困测量的理论与方法[J].地理学报,2020,75(4):753-768.
- [29]Zhou Yang,Liu Yansui.The geography of poverty:Review and research prospects[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9,93:408-416.
- [30]陈烨烽,王艳慧,王小林.中国贫困村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J].地理研究,2016,35(12):2298-2308.

注释:

1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确立了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并将其作为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随着 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本文将其改称为原连片特困地区。14 个片区中的 11 个片区(本文所指的原第 I 类连片特困地区)与其余 3 个片区(本文所指的 II 类原连片特困地区,主要位于边境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国家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差异较大。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原第 I 类连片特困地区所辖的 505 个县域。正文相应部分将对此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此外,为简化起见,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文中多处将“原连片特困地区”简称为“片区”。

2 此处的原连片特困地区 2020 年人均 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作者根据第 I 类片区的 505 个县域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各县（区、市）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